

“政教分离”制度下自民党 与统一教的“利益输送”

鞠佳颖 吕耀东

[摘要] 实行“政教分离”的日本，政党政治与宗教团体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宪法规定了宗教不能干预国家政权的行政事务，但宗教团体参与社会政治的权利和自由并未被剥夺，由此产生政党与宗教团体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问题。当宗教团体支持的政党执政后，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宗教团体提供特殊的政治保护。自民党与统一教正是通过相互“利益输送”连接起来的，自民党是统一教在政权领域的利益代表者和实现者，统一教则是自民党赢得政治权力所需要的社会支持者和财力后援，自民党议员利用政治权力，给予统一教政治和行政上的关照，以换取长期执政所需的“金钱”与“选票”，这明显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第一项。安倍遇刺使得自民党与统一教的“金权政治”交易大白于世，亦反映出日本政坛背离“政教分离”原则的政治腐败根深蒂固。

[关键词] 政党；政教分离；自民党；统一教；利益输送；金权政治

[中图分类号] D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01(2024)03-0038-13

[收稿日期] 2024-03-02

[DOI] 10.19669/j.issn.1009-5101.2024.03.0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日本海洋战略及政策研究”(20FJB00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十四五”重大项目“国际秩序大变革背景下的东北亚相关国家战略调整研究”(22JJD810033)，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战后日本国际战略及政策研究”(2023RBSB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鞠佳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本外交研究；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政治、外交及大国关系、日本外交政策与中日关系研究。(北京 100007)

引 言

当前日本的政治生态中都会存在政党与宗教团体频繁互动的现象，安倍遇刺则反映出了其背后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相互利用问题。“任何一种政治运作都离不开具体的政权，执政者为确立自身政权的合法性，需要思想意识、道德信仰上的后盾，而宗教就往往成为其论证自身合法性的有力机制。”^{[1]47} 国家对宗教采取何种态度，取决于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条件。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前，实行神道国教化的路线。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之下，“宗教沦为国家实施专制统治和对外侵略的工具。”^{[2]31} 二战后，《日本国宪法》《宗教法人法》的确立，为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提供了法律保障，国家权力不得对宗教团体进行不当干预，宗教团体及其运动得以自由发展。日本各政党为获取选票、巩固票田基础，加强对宗教团体的拉拢和利用；“宗教团体亦开始支持特定候选人和政党，宗教团体领导层时而下达指令动员选票”^[3]，一些议员在其支持

下得以当选乃至入阁。由此产生社会舆论对于“政教分离”原则、“金权政治”及“利益输送”^①的高度关注。尤其是“政教分离”原则逐渐呈现出“要求严格化的发展趋势”^{[4]96}。本文立足于此,试图明晰“政教分离”的概念,并以宪法中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分析日本政党与宗教团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输送”关系,并探讨这种关系的状况及政治影响。

一、“政教分离”概念与日本政教关系的宪法释义

在探讨日本政党与宗教团体关系之前,有必要阐明“政教分离”概念的法理源流及内涵,目的在于厘清“政教分离”是否意味着政教的完全分离,政党与宗教团体之间的互动是否合法,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政教互动程度应在何种限度之内。

(一)“政教分离”的源流及涵义

早在17世纪,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就用一堵墙将教会与世界隔开代表他对“政教分离”主义及其宗教自由的想法。^[5]而“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基本制度和原则,‘政教分离’是近现代才开始的”^{[1]59}。自1791年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首次明确提出“政教分离”后,其他国家起而效仿。整体而言,“政教分离”的内涵主要包括:在教会与国家之间设立“隔离墙”,禁止宗教和国家机构之间的联系;严格区分公民政府的事务与宗教事务,并正确规定二者之间的界限;政治权力对于各种宗教保持中立,国家确保自身相对宗教而言的独立性;国家机构不能通过国家职能来增强宗教或是抑制宗教活动,保障宗教自由。^②“政教分离”是一个普遍存在但没有确切的、公认定义的概念。从广义上来看,“政教分离”是指国家的非宗教性以及宗教的中立性。国家与宗教的结合不仅无益于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而且与国家权力的勾连将会带来宗教的堕落、腐败,一旦国家与宗教对立,将导致国民产生对国家的怀疑、憎恶,可能会破坏国家本身。因此,国家与宗教分离是最理想的状态。^{[6]1064-1065}在此意义上,广义的“政教分离”可理解为“思想或是理念上的‘政教分离’”。狭义上的“政教分离”是指:“如果人们通常同意它涉及一种政治与法律制度,那么该制度的功能是在国家与宗教之间建立某种距离。”^[7]也就是说,狭义上的“政教分离”是将上述观念转化为制度,由此“将宗教置于国家权力的彼岸,保障宗教‘私’层面的内部主观性”^{[6]1064},可理解为“制度上的‘政教分离’”^{[8]115-116}。本文即是从法律制度层面上的政教关系来衡量自民党与统一教之间的互动。

(二)“政教分离”主体的日本宪法释义

作为法律规范的“政教分离”主要包括“国家与教会的分离(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和“国家与宗教的分离(separation of state and religion)”两种类型。^{[8]116-117}从目前实施严格“政教分离”的美国、法国、墨西哥、土耳其、印度、韩国等国家的立法来看,“政教分离”一

^①“利益输送”最初是由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森·拉安特(Johnson La Aorta)等人在2000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它被用于描述企业的控制者或内部人为了个人私利将企业的资产和利润转移出去,构成对少数股东或外部人利益的侵占的行为。目前,我国法律对“利益输送”没有明确界定。“利益输送”一般是指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转移的行为,“利益输送”是一个“腐败之门”,起到“总闸”和“通道”的作用,它是所有利益输送行为的概括性范畴与腐败的“母体”,又是衍生其他腐败的工具性“桥梁”,包括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等。参见杨晓培《利益输送的刑法意义研究》(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19)。

^②参见 Philip Hamburger.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若瑟兰·麦克卢尔、查尔斯·泰勒《政教分离与良心自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15页),HAMMETT H D.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By One Wall or Two (Journal of Church and State,1965年第2期),洛克《论宗教宽容》(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页)。

般是指“国家与教会的分离”^①。若界定日本“政教分离”的主体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前,日本确立了“神社神道国教化”的路线。“国家神道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其主要表现为:国家权力的宗教正当化;通过靖国神社鼓动军国主义。”^{[6]976}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为消除日本的军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战结束后,联合国盟军最高司令部(GHQ)先后向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下达《自由指令》《神道指令》,宣布神社神道与国家分离,包括神道在内的所有宗教与国家权力分离。^{[9]13}随后在GHQ的主导下出台了《日本国宪法》,从法律上否定了国家与特定宗教的结合,确立了“日本国家权力的非宗教(世俗)性”^[10]。《日本国宪法》中虽未出现“政教分离”一词,但一般认为第二十条第一、三项与第八十九条是有关“政教分离”原则的体现,其具体规定如下:“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接受国家特权或是行使政治上的权力”^{[11]237}、“国家及其机关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11]238},以及在财政方面“公款及其他国家财产,不得用于宗教组织或宗教团体的使用、为其提供方便或是予以维持”^{[11]739-740}。从法律条文的表述来看,“政教分离”的主体、具体分离的限度等并未予以明确、清晰地规定。因此对于“政教分离”的理解各异。部分学者认为“政教分离”的主体是国家与教会(宗教团体)^②,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其主体是国家与宗教^③,还有部分学者将“政教分离”表述为政治与宗教分离。^④日本政府机构的宗教及宗教文化资源管理部门也常常混淆这一概念,在其“每周报告”中混合使用“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国家与教会的分离”等词汇。^{[8]51}日本现行宪法中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是由美国制定的,其主要目的是针对日本的国家神道,且“宗教”这一概念过于抽象,法律规范中的“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的界限也过于模糊,在实际的法院诉讼判决中,关注点更多的是在宗教活动、宗教行为本身,法律意义上的“教”更倾向于“包括神社、教会、寺院、教派等在内的宗教团体”^[12]。关于“国家(state)”一词,这一概念存在较多争议,“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观点都交织于其中,除了将国家看作是进行阶级统治的‘上层建筑’、组织和协调不同社会力量的‘统一的社会结构’等,还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人类共同体的持久形式,大可采用其最一般的用法,即将国家等同于政治实体”^{[13]793}。鉴于本文所讨论的议题涉及具体的政党与宗教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由此本文中的“政教分离”意味着(政党等)政治实体^⑤与宗教团体的分离。

(三) 日本有关“政教分离”的法理限度

日本政教的分离程度是严格的完全分离,还是宽松的适当分离?其分离限度是什么?为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首先应明确《日本国宪法》第20条第1、3项与第89条中“宗教团体”、

①参见阿部美哉《政教分離——日本とアメリカにみる宗教の政治性》(サイマル出版会,1989年版第4页),山折哲雄《世界宗教大事典》(平凡社,1991年版第976页)。

②参见岸本英夫《世界の宗教》(大明堂,1993年版第93页),小野祖教《津地鎮祭問題と名古屋高裁の判決》,刊载于《法と宗教(政教関係を正す会[編])》(経済往来社,1972年版第126页),遠藤浩、福田平《法令解釈事典 上卷》(ぎょうせい,1987年版第42页),大原康男、百地章、阪本是丸《国家と宗教の間——政教分離の思想と現実》(日本教文社,1989年版第49页)。

③参见芦部信喜先生還暦記念論文集刊行会《憲法訴訟と人権の理論》(有斐閣,1985年版第527页),遠藤浩、福田平《法令解釈事典 上卷》(ぎょうせい,1987年版第42页),清水睦《基本的人権の指標》(勁草書房,1979年版第116页),赤澤史朗《近代日本の思想動員と宗教統制》(校倉書房,1985年版第105页)。

④参见村上重良《天皇制国家と宗教》(日本評論社,1986年版第246页),飯坂良明《宗教と現代》(玉川大学出版部,1981年版第183页)。

⑤所谓政治实体,就是在一国的政治生活里含有政治性质和具备发挥政治功能作用的一切组织、群体和公民个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制度。具体而言,政治实体包括:阶级、阶层、政治性群体与团体、利益集团、政党、国家机关和具有政治权利的公民,政治实体各部分间的各种关系,国家通过法律制定的各种政治制度,等等。参见吴卫生、童德华《简论政治实体的特征》(《理论月刊》1999年第Z3期)。

“政治权力”和“宗教活动”的含义。

《日本国宪法》中规定的“宗教团体”，不仅包括《宗教法人法》中规定的宗教团体，而且包括进行宗教礼拜、以宗教宣传为目的的所有团体；关于“政治权力”的含义，一般认为是由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特有的统治权力，包括立法权、课税权、裁判权、公务员的任免权等；“宗教活动”是指“以宗教宣传为目的的一切活动，其中带有教育性质的活动被称为宗教教育，也有部分人认为宗教上的祝典、仪式等行为本身也应视为宗教活动”^[11]239-243。日本最高法院在“津地镇祭违宪诉讼”^①这一关于“政教分离”的首个代表性案例中，对于宪法中规定的“宗教活动”作出如下解释：宗教活动并非指国家及其机关所有涉及宗教的活动^②，而是指类似传教、教化、宣传等宗教教育活动。此外，“如果其他的宗教庆典、仪式和活动等也具有上述目的和效果，也视为宪法中规定的宗教活动。”^③通过上述判示可以看出，在判断国家或政府的某一行为是否属于宗教活动时，应当“从内在标准和外在标准两个方面进行判断。内在标准是行为的目的是否具有宗教意义以及行为的效果是否促进和干涉了宗教；外在标准是行为的实施者、仪式等是否具有宗教因素”^[2]38。

鉴于日本的宗教历史、信教多元化现象，为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解释亦很严格和规范。譬如，“若赋予神社神道的神官、神职人员公务员的地位是违宪的。宗教团体不得行使立法权、行政权、裁判权、课税权等应由国家垄断的统治权力。国家及其机关应禁止一切基于宗教的传教、教化，以及宣传宗教为目的的祈祷、礼拜、庆祝仪式等带有体现宗教信仰的行为。”^[6]1065但事实上，政教完全分离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宗教作为社会一体化的基本因素，只有在结构单一，氏族成员的血缘同一、宗教同一、行为模式同一的极稳定的神圣的社会中才能看到其最纯的形式。”^[14]同时，强调“政教分离”原则，也存在限制宗教活动的可能性，很难精准地确定宗教活动在多大程度上被包含在政治的范围内，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复杂性使得“政教分离”原则的实施较为困难。^[4]96因此，在政治实践中，所谓的“政教分离”，并非指宗教对政治漠不关心或是回避政治，而是指防止国家权力干涉宗教，同时防止宗教为获取政治权力或政治特权而热衷于投身政治，正确维持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④

综上所述，宪法在规定“政教分离”的同时，也规定了“宗教自由”，使得宗教团体有了参与政治活动的空间。因此政治无法与宗教脱离形成“真空状态”，二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互动。本文基于政治与宗教的互动及可能的“利益输送”，通过选取自民党与统一教这一个案进行分析，从特殊性中探讨一般性的存在，可进一步了解日本国内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把握宗教

①“津地镇祭违宪诉讼”起因于1965年三重县的津市举行体育馆开工仪式，由于市政府聘请神社的神职人员并采用神道教的仪式进行了开工典礼，最后又用公款支付了答谢金和祭祀物代金，于是，该市议员以公款支出行为违反了《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和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向市长提起了损害赔偿的诉讼。一审地方法院认为：该开工仪式虽然表面上看属于神道的宗教仪式，但实际上并没有宣传和传播神道的目的，因此，与其说属于宗教活动，不如说是习俗活动更合适。但是，二审名古屋高等法院则做出了违宪的判决。最终，最高法院推翻了二审判决，与一审判决意见基本一致，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参见最高裁判所大法廷の判決。事件番号：昭和46(行ツ)69，昭和52年7月13日判決，民集第31卷4号533页。详见裁判所网站：https://www.courts.go.jp/app/files/hanrei_jp/189/054189_hanrei.pdf。

②类似观点还可参见小嶋和司《宪法概説》：“宪法第20条第3项所禁止的‘宗教活动’并非包括所有带有宗教色彩的活动，如遵照死者或死者家属意愿举行佛道、神道仪式的慰灵祭，即使其举办者是国家或是公共团体，也是可以的。”（《良書普及会》1987年版第194页）

③最高裁判所大法廷の判決。事件番号：昭和46(行ツ)69，昭和52年7月13日判決，民集第31卷4号533页。详见裁判所网站：https://www.courts.go.jp/app/files/hanrei_jp/189/054189_hanrei.pdf。

④飯坂良明《宗教と現代》（玉川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185页）。类似观点还可参见顾肃《宗教与政治》政教分离制度虽以政治与宗教的分离为其根本特征，但这种分离同时也要求政治与宗教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关系（《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与政治的内在联系,为理解宗教团体与日本政党政治相互间的利益关系提供更加清晰的解释。

二、自民党与统一教的互动历程及“利益输送”

战后日本新兴宗教团体数量迅速增加。究其原因,一是通过《人权指令》《神道指令》《宗教法人令》《日本国宪法》《宗教法人法》等一系列法案所确立的“政教分离”与“信教自由”原则,为战后日本宗教的迅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据统计,截至2022年12月31日,日本国内宗教团体数目已达210746个,宗教信徒数为179560113人^[15]。二是战后相当长时间里,日本国民生活困苦、社会混乱,人们皈依宗教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给民众带来失业、饥饿、贫困、死亡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16]这些因素导致战后初期新兴宗教团体大量涌现。三是冷战前后的石油危机、泡沫经济浪潮、薪资福利差、生活环境恶化等日本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带来价值观念的混乱,给各种新兴宗教团体吸纳大量信教成员提供了有利条件。^[17]因此而产生、壮大的统一教等新兴宗教团体及信众逐渐成为日本各政党竞相拉拢、争取的政治资源和“票田”,各宗教团体亦通过“利益输送”寻求发展壮大的政治靠山,统一教就是典型案例。

统一教^①,旧称“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现称“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其作为“基督教派别下的新兴宗教团体,于1954年由韩国牧师文鲜明在首尔创立,1958年传入日本,1964年经东京都知事认证成为宗教法人”^[18]²⁵。统一教“最初将日本佛教组织‘立正佼成会’的成员吸收发展为信徒,加强组织基础;通过合宿等研修会,在学生青年男女之间不断增加统一教的支持者”^[19]。目前,统一教在日本国内共设立284个分部^[20]。根据公益财团法人国际宗教研究所(RIRC)宗教信息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统一教在日本国内共有60万信徒,”^[21]可见其在日本的影响力之大。统一教在日本得以迅速发展的另一主要原因是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保守派议员的推动。“战后新兴宗教团体与自民党的结合最为密切、活动最为活跃,”^[22]¹⁶⁸特别是,统一教将在日本的教团组织置于指挥系统下,让信徒积极参与政界工作,支持自民党政权,以确保统一教的在日存在合法性;自民党政权方面作为回报,为统一教提供政治保护以及行政便利,打造“共存共荣”的关系。^[23]⁹⁻¹⁰

第一,自民党保守派利用统一教“反共”,统一教则通过所属“反共”与“修宪”团体迎合以保守主义为核心的自民党意识形态。“新兴宗教团体往往会衍生出许多团体”^[17]⁸⁷,统一教衍生出如“国际胜共联合会”、原理研究会(CARP)、世界和平联合会(UPF)、世界战略综合研究所、“胜共UNITE”(旧称:“国际胜共联合大学生游说队UNITE”)等不同的政治团体。^[24]其中,“国际胜共联合会”和“胜共UNITE”^②主张“反对共产主义活动”、宣扬“中国威胁”、呼吁“修宪”,赞成安保法案,支持制定“间谍防止法”,积极推进“日韩隧道建设构想”,通过推行符合自民党价值取向的主张来迎合以保守主义为核心的自民党意识形态,从而拉拢自民党的保守势力,获取在日发展空间。

日本“国际胜共联合会”是“在自民党右翼政治家岸信介的支持下成立的,是反共产主义

①在日本,有“旧统一教会”“统一教会”“统一协会”“统一教”等不同的叫法,本文统称为“统一教”。

②“胜共UNITE”是由来自日本26所大学的学生组成的学生团体,呼吁维护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主要指导思想为“胜共思想”,即“战胜国内外的共产主义”和“战胜侵蚀日本国内文化的共产主义思想”。UNITE声称并非是“国际胜共联合会”下属组织,而是学生自发组织的自主独立组织。但实际上同为统一教的下属团体。参见“胜共UNITE”官网:<https://www.ynite.org/about-us/name-change/>;ユナイトメンバーに配信された教団内部メール。参见铃木エイト《自民党の統一教会汚染 追跡3000日》(小学館,2022年版第72页)。

的右派保守组织”^{[23]164-165}。统一教妄称，“恶魔导致人类堕落，而促使恶魔诞生的正是共产主义，为此创办‘国际胜共联合会’，以开展反共运动以消灭共产主义这一敌人。”^{[4]29-30} 冷战时期，韩国总统朴正熙曾以“反共为第一国事”，颁布了“中央情报部法”和“再建国民运动法”，韩国中央情报局（KCCIA）为迎合朴正熙的军事独裁政权，对统一教加以利用，使其充当“反共”的马前卒。日本的反动势力见状也将“国际胜共联合会”引入日本。“1967年7月，韩国方面文鲜明、刘孝芝，日本方面笹川良一、白井为雄等曾在日本殖民侵略战争中特务机关活动的成员举行了‘木栖湖会谈’，洽谈成立事宜。翌年，笹川良一、岸信介和儿玉誉士夫等人作为发起人，在日本成立了‘国际胜共联合会’，”^{[18]29-30}“会长是日本统一教的首任会长久保木修己，名誉会长是笹川良一，其常将埼玉县的户田研修中心提供给统一教作为研修会场所。”^{[4]29-31}

统一教在日本成立“国际胜共联合会”后，在吸纳更多信徒的同时，通过岸信介等人拉近与执政党的距离。由此，大量积极“反共”的“国际胜共联合会”信徒渗入日本政商界。1974年5月文鲜明在帝国饭店举办“希望之日”宴会，岸信介、福田赳夫、安倍晋太郎等40名自民党国会议员以及商界的重要人物出席。在1978年的京都府知事选举中，“国际胜共联合会”不仅出动了19辆宣传车和2000名信徒，还通过《思想新闻》操控“反共”舆论，以支持自民党参议院议员林田悠纪夫参选。前自民党众议院议员辻宽一在接受《周刊文春》采访时曾表示：希望“国际胜共联合会”“能加入自民党，让党内青年部变得刚强有骨气”。前自民党众议员前尾繁三郎在回忆录《政治家的方丈记》中写道：“共产党一如既往地动员全国的民青、民商反动，为此，需要寻求‘国际胜共联合会’的协作对抗共产党。”^{[18]30}

1979年2月，“国际胜共联合会”等6个团体设立“间谍防止法制定促进国民会议”。同年6月，在“国际胜共联合会”的主导下，全国47个都道府县结成了“间谍防止法制定促进县民会议”，由地方会议提起决议，声援旨在将“间谍防止法”立法化的自民党。^{[23]165}此外，在制定“家庭教育支援法”“青少年健全养成基本法”等，以及支持自民党“修宪”等方面给予了积极响应。到1990年初，众参两院约有200名议员被称为“胜共推进议员”。^{[23]166}

随着冷战结束，“国际胜共联合会”的影响力有所减弱，“胜共推进议员”锐减，但进入21世纪以来又迅速抬头，支持执政的自民党色彩鲜明。保守派学生团体“胜共 UNITE”针对安倍政权出台安保相关法案的反对声音，于2016年前半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游说活动，演讲内容为“反对共产主义”“支持安倍政权”“赞成安保法案”“支持修改宪法”等。^{[23]50}同年6月上旬，安倍在首相官邸会见了统一教的日本会长德野英治等人。^{[23]80}同年11月，“胜共 UNITE”福冈支部举办“UNITE 学生论坛”，自民党众议员原田义昭发表基调演讲。^{[23]81}2017年“胜共 UNITE”关西支部举办学习会，自民党众议院议院长尾敬参加，随后“胜共 UNITE”在东京、仙台、福冈三地召开“实现修宪大会”，自民党众议院议员菅原一秀、原田义昭参加了集会。^{[23]123}

第二，统一教为自民党议员提供选举支持，自民党议员出席活动为其“站台”，扩大影响力。统一教为拉拢自民党势力，积极开展各种支持自民党政权的活动。统一教在日本全国比例选区的团体票约为8万，在选定投票人选时，统一教通常有两个标准，一是与首相官邸关系较近的人；二是在参选者原本票数的基础上加上统一教的6—8万选票可以成功当选的人。在2013年7月第23届参议院选举期间，统一教向全国信徒下达指令为安倍首相的亲信北村经夫提供选票支持，^①北村经夫总票数（142 613 票）中有8万是统一教的团体票。^{[23] 23}北村经夫的后援会名单上列出了统一教所属“‘国际胜共联合会’京都府联合会支部长”“世界和平联合会奈良县

^①2013の参院選で流出した教団内部文書，参見鈴木エイト《自民党の統一教会汚染 追跡 3000 日》（小学館，2022 年版第 8 頁）。

联合会事务局长”“世界和平联合会兵库县联合会事务局长”等名字,统一教还向北村的福冈选举事务所派出了世界和平联合会总部的女性员工作为事务所的工作人员。^{[23]17}在23届参议院选举后,统一教举办的“统一教日本宣教55周年”集会活动上,自民党作为对北村经夫选票支持的回报,派中川雅治、柳本卓治出席活动并致辞。成功当选后的北村积极出席统一教的活动,在2019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北村再次以178210票成功连任。^{[23]210}2016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前,统一教下达向自民党候选人宫岛喜文投票的指令。宫岛以122833票当选,其中来自统一教的选票约为6万至7万。^{[23]62}在2017年5月14日统一教举办的万人集会“东京孝情文化节”上,当选自民党参议院议员宫岛喜文、山本朋广出席。宫岛喜文表示:“在去年7月参议院选举中多亏有大家的帮助,我才得以当选。”^{[23]98}山本朋广表示:“非常感谢平日统一教会会长德野英治对自民党的大力支持,安倍政权才得以迎来第五年的‘长期稳定政权’。”^{[23]100}

对于统一教的支持,自民党的回报之一是为统一教的集会活动发贺电、致辞和演讲。2014年9月23日,统一教举办了青年活动“全球青年节日(Global Youth Festival)”,自民党青年局次长东乡哲也、众议院议员田沼隆志作为嘉宾出席,众议院议员鸠山邦夫、前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发来贺电。当鸠山被问及贺电的缘由时,他表示,统一教提供了很多支援,给了安倍政权很大支持。在2014年10月第47届众议院选举前夕,统一教举办“世界和平从祝福结婚开始”特别演讲会,自民党总裁特别助理萩生田光一、参议院议员中川雅治出席并致辞。^{[23]33-34}2015年10月12日,统一教举办“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启航纪念大会”,前金融事务担当大臣龟井静香等国会议员发来贺电。^{[23]45}2018年7月1日,统一教举办“日本宣教60周年纪念大会”,自民党议员柳本卓治、工藤彰三、宫岛喜文、神山佐市出席,木村义雄等人发来贺电。22日,统一教举办“冈山2018年孝情文化和平节日庆典”,自民党国会议员山下贵司、北村经夫发来贺电,时任厚生劳动大臣的加藤胜信让其秘书代理出席,众议院政治伦理审查会会长逢泽一郎作为来宾代表上台致辞。^{[23]150-151}10月25日,山本朋广、武田良太、逢泽一郎、穴见阳一、奥野信亮、柳本卓志、宫岛喜文等自民党国会议员出席“‘国际胜共联合会’成立50周年”大会。^{[23]161-163}2019年10月5日,统一教的前线组织UPF召开国际领导者会议,美日韩国会议员、教会及相关组织的干部参加,日方出席会议的有自民党政治伦理审查会会长兼宪法修正推进总部长细田博之、前环境大臣原田义昭、奥野信亮、工藤彰三、北村经夫、江岛洁、岛村大,以及前参议院议长伊达忠一。^{[23]222-223}2021年9月12日,UPF举办“为神统一韩国的智囊团”大会,会上播放了安倍致辞的录像带。^{[23]313-314}同年11月7日,“国际胜共联合会”主办“救国救世胜共大会”及修宪活动,自民党众议院议员中根一幸以“修宪与道义国家日本的再生”为题做嘉宾致辞。^{[23]337-338}

第三,统一教广交自民党议员,分享“政治红利”,自民党议员为统一教提供政治便利。统一教的月刊机关志《世界家庭·world family》(2017年3月号)刊登了统一教的活动方针:“日本的统一教运动应将重点放在议员交往上。”^{[23]124}统一教广交自民党政要,以获取行政、政治上的便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允许韩国统一教创建者文鲜明违法进入日本。根据日本的《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规定,曾在美国被判处一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的文鲜明不得进入日本,但是却通过时任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的认可,取得法务大臣的特别许可进入日本。^{[18]33}

二是阻止日本东京警视厅公安部的违法活动审查。2009年,日本东京警视厅公安部对东京涉谷统一教所属的“新世”印章销售公司^①的违法活动进行审查,对涉事的统一教南东京总部事

①“新世”印章销售公司实际上是“统一教”信徒采用“灵感商法”诱导他人购买“通灵商品”的公司。

务所、涉谷教会、豪德寺教会进行了强制搜查，并计划搜查统一教松涛总部。一旦松涛总部被搜查，统一教将可能面临被解散的处境，于是统一教开始寻求警察官僚出身的国会议员的庇护。“国际胜共联合会”的会长梶栗玄太郎向龟井静香、小野次郎等自民党国会议员“求救”后，警察便停止了对统一教松涛总部的搜查。^{[23]28-29}

三是给予统一教名称变更申请的便利。从1997年至2015年的18年间，统一教一直在致力于教会的更名，1997年开始统一教数次向文化厅申请更名，均因更名可能危害社会而被断然拒绝。全国律师联合会、日本脱离邪教协会（JSCPR）均认为一旦更名申请通过，将可能导致劝诱被害者的增加。因为，如果统一教信徒隐藏传教目的，仅以“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之名对他人进行劝诱时，他人很难判断这就是变相的“灵感商法的统一教”。然而，文化厅一直以来都秉持拒绝接受申请的态度，却在2015年突然转变，受理了统一教的更名申请，并认证了名称变更申请，统一教将“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更名为“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据称，是文部科学省大臣下村博文强行让文化厅通过统一教的更名申请。统一教日刊《世界日报》曾在2013至2014两年间三次刊登下村博文的采访和座谈会报道，并在月刊《viewpoint》也进行了转载。^{[23]37-39}2012年，下村负责的自民党东京都第11选区支部向统一教下属的“世界和平女性联合会”缴纳会费15000日元。2014年9月，统一教所属政治组织举办的“守护日本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西神奈川大会，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等人出席了此次会议。在下村辞任文科大臣后，根据2017年11月东京都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2016年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显示，在下村担任代表的自民党东京都第11选区支部于2016年3月收取统一教旗下世界日报社6万日元。^{[23]43}时任文部科学省事务次官的前川喜平表示：“当时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对于不能受理统一教更名申请的意见基本一致，但最终迫于政治压力通过了申请。这可能与下村博文的关照有关，统一教与第二次执政的安倍政权关系密切。”^{[23]42}

通过上述史实可以看出，自民党与统一教的互动之频繁。自民党作为统一教在政权领域的利益代表者和实现者，出席统一教举办的相关活动为其“站台”、为其提供政治和行政上的便利，以赢得政治权力所需要的社会支持者和财力后援，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统一教广泛结交自民党议员、通过其下属的“国际胜共联合会”、“胜共UNITE”等“反共”与“修宪”团体迎合以保守主义为核心的自民党意识形态，以分享自民党的“政治红利”，为统一教的在日发展获取强大的政治能量。自民党与统一教各取所需，其本质即是“利益输送”。

三、自民党与统一教的互动本质

日本新兴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新兴宗教团体与政党结合的形式以及相互间的利益关系。^{[22]168}“政治家常常会迷失本来的利他理想而把追求权力作为目标；宗教徒也随着组织的发展或参与政治而面临着陷入权力追逐的危险之中。”^{[25]121}统一教与自民党接近，是因为希望通过自民党所拥有的政治权力，来实现其利益；而自民党与统一教接触，是因为自民党希望统一教能成为其的支持力量。因此，具有丰富政治资源和影响力的自民党议员为统一教提供保护和便利，统一教则对自民党议员提供选票支持和财力帮助，其本质是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的相互“利益输送”，意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

（一）自民党对统一教的“利益输送”诉求

第一，自民党将统一教视为派系争斗的政治工具。“政党是以权力为目标而组织起来的，获得国家权力是其终极目标，但作为次级目标，即争夺党内权力的斗争，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25]119}在日本政党政治中，牢固而广泛的社会支持基础对保证政党在竞争中获胜具有决定性

的意义。“在议会内阁制下,一个政党要成为执政党,并长期保持政权,关键取决于拥有议席的多数,自民党保证多数议席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在社会中形成庞大的支持自民党的社会组织。”^{[26][281]}而统一教正是自民党所需要的、“忠诚”的庞大社会组织之一。2018年6月,全国律师联合会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召开紧急集会,向众参两院的所有国会议员提交请愿书,要求所有议员拒绝接受统一教的选举支持,不出席统一教活动,不向其发贺电。^①但这一请愿遭到无视。尽管因统一教利用“灵感商法”^②劝诱、骗取高额捐款的受害者仍在增加,但部分自民党议员为了自身的利益选择无视,甚至不惜牺牲国民的利益,在统一教传教过程中继续扮演着“广告”宣传的角色。

第二,统一教能够为自民党议员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政治家的政治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党支部、政治家个人的资金管理团队、后援会三个政治团体。在2000年以后禁止企业及团体向政治家个人捐献政治献金的规定实施后,政党支部成为政治家接收企业及社会团体献金的重要入口,自民党积极利用新设立的(自民党)政党支部筹集政治资金,由此出现了政治家与社会团体间大额“政治献金”无限制的流转问题。^{[27]152-156}于是,《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和《政党助成法》从法律层面对政治资金相关问题进行了规范,将政治组织以及公职候选人的政治活动置于国民监督之下,对政治组织成立申报、政治资金收支公开、政治组织和公职候选人的政治资金收受正规化等方面采取了相应措施。^[28]但是,上述法规并未杜绝国会议员通过其个人的资金管理团队筹集政治资金的渠道,《政治资金规正法》的修正案并不能真正有效铲除滋生政治资金腐败的土壤。对于大部分的政治家来说,维持日常的选举等活动需要大量资金,候选人为赢得选举、议员为获连任对于资金的迫切需求,使其不得不另寻出路,而宗教团体对于政治资金的支持则成为新的财路。譬如,统一教每月有500万日元的预算专门用于自民党政治家对策经费。^{[23]29}竞选的财政压力使部分议员产生了接受统一教违法“政治献金”的动机和行为。

第三,利用统一教强大舆论攻势和政治动员效果来达到政治目的。一般来说,“一个宗教团体越是组织严密化,政治因素也就越是显著。”^{[25]120}统一教设有总部、支部,其下再设支部,直到信徒个人,相互间建立了横向和纵向的联系,管理较为严格。统一教作为一个宗教团体,教祖具有绝对化的宗教权威,信徒拥有较为牢固的连带意识,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在这种半封闭的组织中,教祖的政治意向直接决定了信徒的投票意向,选票的分配均由教会上层决定。这对于政党来说更加容易募集选票。统一教要求信徒必须根据教祖或教会的明确要求投票。在2013年7月日本第23届参议院选举期间,统一教曾向全国信徒发送内部传真:“参选的北村经夫是出生于山口县的政治家,是天照黄大神宫教教祖北村沙约的孙子,安倍首相亲自出面委托支援北村。有消息称参议院选举后国会相关部门将追查本团体,北村此次能否当选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所以恳请大家发动亲属共同进行投票。”^③2016年1月,“胜共UNITE”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呼吁“支持安倍政权”“赞成安保法案”“支持宪法改正”,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舆论向有利于自民党保守派期望的方向发展。可见,拥有严密的组织机构、教祖自上而下的号召力以及数量众多信徒的统一教,对于自民党而言,是可利用的重要政治工具。

①参见铃木エイト《自民党の統一教会汚染 追跡3000日》(小学館,2022年版第142页);宫本彻《統一協会による被害を根絶し、政治との癒着を一掃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前衛,2022年第1018期)。

②所谓“灵感商法”是指利用人们的宗教信仰和不安心理,通过“祖先鬼魂作祟”“家人会遭遇不幸”等话术煽动人心,强行高价推销印章、念珠、多宝塔、“圣书”、人参浓缩液等“开运商品”。

③2013の参院選で流出した教団内部文書,参见铃木エイト《自民党の統一教会汚染 追跡3000日》(小学館,2022年版第8页)。

第四, 自民党还将统一教视为对朝关系发展的重要纽带。如, 自民党政权希望通过与朝鲜关系友好的统一教解决“绑架问题”。统一教一直与朝鲜保持着友好关系, 对于想要解决“绑架问题”的自民党政权是具有吸引力的。2022年2月, 在统一教举办的“世界峰会”上, 安倍发贺信表示: “如果不解决日朝间的绑架问题和核问题, 朝鲜半岛南北问题不会有任何进展。”^[29] 在自民党执政者看来, 统一教能在发展日朝关系问题上起到桥梁或者沟通作用。

(二) 统一教对自民党“利益输送”的政治意图

第一, 统一教意在加强与执政党的联系, 为教会的在日活动寻求政治庇护。统一教在20世纪80年代因“灵感商法”、劝诱入教、“集体婚礼”等负面新闻被频繁报道, 可谓声名狼藉。90年代政治家也开始与统一教、“国际胜共联合会”保持距离。直至2000年末, 日本多个城市的统一教“灵感商法”公司被揭露, 统一教担心会危及松涛本部教会, 于是开始加强与执政党的联系。^{[23]9-10} 统一教加强对执政党的“利益输送”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信众的非常规“助选”。派遣信徒为自民党候选人充当选举动员, 昼夜不停的贴海报、发传单、打电话, 甚至会撕毁对手候选人的海报、诽谤中伤对方。统一教在选举中提供的支持力量被政治家所认可, 于是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开始在选举时加以采用。二是免费为政治家输送秘书, 被送去的秘书也有后来成为参选候选人和议员的案例。^{[18]31-32} 统一教的月刊机关杂志《世界家庭·world family》刊登了统一教的活动方针: “实践证明, 日本的统一运动应将重点放在议员交往和教会原理教育上。迄今为止, 信众结成后援会支援了许多议员, 并通过两小时的吹风会、两天至四天的统一教原理研讨会等形式, 对多数议员进行了教育。”^{[23]124} 受统一教支持而当选的议员, 需在当选后, 参加统一教为期4至7天的研修活动, 在反复参加研修活动后, 也有一些议员成为了事实上的统一教信徒。^{[18]32} 统一教通过其不同的下属团体“国际胜共联合会”、“胜共UNITE”、世界和平联合会(UFP)等, 试图将自身的宗教影响施加给现实政治, 借此换取自民党政治或行政上的支持和照顾。

第二, 利用“亲教”自民党政治家的“广告”作用, 改变统一教的负面形象, 提高身价、扩大社会影响。据统计, 从1987年到2021年日本全国律师联合及全国消费生活中心收到了约34 537件关于统一教“灵感商法”的投诉案件, 涉及金额超过1 237亿日元。^{[23]32} 2007年到2010年间, 日本的统一教“灵感商法”店铺被揭露违法, 民众敬而远之。为此, 统一教迫切需要社会的正面评价, 于是通过“金钱”和“选票”拉拢执政的自民党为其“站台”, 将自民党议员“热心”于统一教的事迹予以夸张宣传, 将自民党议员、议会候选人的名字、照片及政治主张等相关情况登载在教团的主要报纸、杂志上, 让信徒和读者认识、了解, 以扩大社会影响力。有时还让议会候选人参加教会内部活动, 与信徒增加亲近感, 影响选民的政治态度和投票倾向, 促使信徒在选举活动中更加投入。作为回报, 一些自民党议员会出席统一教的有关活动, 发贺电或致辞。政治家的出席行为在客观上增加了统一教的可信度和身价。自民党在利用统一教获得选票和资金的过程中, 也自然而然推动了统一教的发展, 使其信徒不断壮大。

第三, 统一教为获取发展空间, 还要求信众迎合自民党的价值取向, 积极参与其政治活动, 谋求统一教的利益最大化。统一教教义《原理讲论》中有一些“韩国中心主义”的文字表述, 如“世界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将以韩国为中心, 各国均处于一个真理之下吸收融合”, “韩语将成为世界语言”,^{[18]29} 从中可见统一教“统一”全世界的野心。为实现这一野心, 统一教将自身打造成有着不同伪装面貌的社会宗教组织, 包括“国际胜共联合会”、“间谍防止法制定促进国民会议”、世界和平联合会、原理研究会、世界和平宗教联合会、世界日报社、光言社、世界和平女性联合会、世界和平青年联合会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统一教下属组织力量, 为获取

在日发展空间,针对日本的政客采取了迎合策略。根据日本《朝日新闻》2024年2月7日和3月6日的报道,日本负责管理宗教团体的文部科学大臣盛山正仁曾在2021年10月众议院选举期间参加过“国际胜共联合会”举办的“国家政策简报会”,并接受了由“国际胜共联合会”主席梶栗正义签署的推荐信,约10—20名统一教信徒每天拨打数百个电话,请求人们支持盛山正仁竞选。“‘国际胜共联合会’支持盛山正仁竞选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获得盛山正仁对‘修宪’的支持。”^①可见,统一教通过提供“选票”支持,积极拉拢日本政客,以迎合以保守主义为核心的自民党意识形态,获取政治庇护,从而不断扩大在日发展空间。

(三) 自民党与统一教“利益输送”的政治腐败

所谓政治腐败,即“政治家或官方决策过程中的官员,利用他们因担任公职而掌握的资源 and 便利,为另外一些人谋取利益,以作为换取一些已允诺的或实际的好处的报偿,而这种行为是受到相关法规明令禁止的”^{[13]594}。自民党议员利用政治权力,给予统一教政治和行政上的支持和照顾,以换取长期执政所需的“金钱”“选票”等社会支持,这明确违背了《日本国宪法》的第二十条第一项,即“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接受国家特权或是行使政治上的权力。”^{[11]237}诸如此类的违法行为之所以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正是因为有掌权者的庇护和纵容使然。

第一,从自民党政治家个人来看,需要社会(包括宗教团体)支持来延长政治生涯。“对于许多议员来说,都希望把政治生命延伸至大臣乃至首相的位置上,一个国会议员要想成为大臣或首相,则取决于他在党内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是由当选国会议员次数决定的,这种依当选次数决定其政治地位高低的政治现实,大大刺激了现任议员为保证下回再度当选而努力。”^{[26]395}因而,日本政治腐败现象频出,问题多出在政治家身上。“一些政治家,或是为自己出人头地而利用政党,或利用其在党内的权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特别是那些为谋求短期利益的政治家,往往采用机会主义的投机手段,进行一切可能的交易和妥协。”^{[25]119}一些自民党官员与统一教的“利益输送”就是典型范例。统一教不仅仅是自民党需要拉拢的政治“票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自民党“金权政治”的传统需要统一教的“政治献金”支持。日本统一教的“政治献金”多来源于信徒的“灵感商法”、高额捐款。信徒买一本载有文鲜明照片及语录的《圣本》需要3000万日元^{[18]25},信徒参加“集体婚礼”需缴纳数十万乃至数百万日元的“祝福捐款”,举办一场“集体婚礼”统一教可获数十、数百亿日元。^{[18]27}以上“灵感商法”集资以及信徒的高额捐款,使得自民党政治家与日本统一教的“利益输送”成为可能的政治腐败。执政的自民党及议员不仅对统一教的违法宗教活动视而不见,反而享受着统一教给予的违法所得。

第二,从自民党执政历程来看,与统一教等宗教团体存在着“利益输送”交易关系。从自民党与统一教的互动历程可以证实,自民党正是借助执政所拥有的政治权力,满足和实现统一教的利益诉求。作为利益回报,统一教向自民党提供政治资金和选票支持,这种双向的“利益输送”持续不断进行,使得日本政治腐败程度日益加深,已成“痼疾”。事实上,日本也并非没有关于政治腐败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但总是无法有效遏制政治腐败的蔓延。究其原因,这些制度实际上是在执政党自民党的主导下制定出来的,而对于用金钱支持长期执政党的自民党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砍断其资金来源的。为了应对日本社会对于“金权政治”的诟病,1993年8月,政府出台了政治改革方案,在政治资金法案的修改问题上,自民党针对原改革提案“全面

^①参见《朝日新闻》:盛山文科相、旧統一教会側と「政策協定」21年衆院選、関係者証言(<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S266H63S26UTIL010.html>),《朝日新闻》:旧統一教会と関係、盛山氏「新証拠」報道の裏側(<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S354QQHS35UTIL00T.html>)。

禁止企业、团体向政治家个人献金”的意见，提出了“政治家可指定不超过两个资金筹备团体”的修正意见，其目的就是要保证自民党能够凭借其政治上的资源换取足够的财源。^{[26]393-394}这就为日后的自民党与统一教的“利益输送”创造了制度条件，政治腐败也随之产生和延续。

第三，体制性腐败是日本产生自民党与统一教“利益输送”的根本原因。“利益诱导型”政治在日本大行其道，一些自民党及政治家与统一教之间充满着利益诱导的成分，构成了心照不宣的金权交易链，导致政治腐败及殃及社会。过去，日本财界、政界以及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中选举区制度是导致政治腐败的罪魁祸首，并确信只要实行选举制度改革，废除中选举区制度及引入小选举区制度就可以实现廉洁政治、政权交替以及以政党为主体的选举，进而推动日本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27]76}1994年日本政治改革废除了中选举区制度，实行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制。然而，利益诱导政治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选举制度就像一部生产国家重要公职人员的机器，要让这部机器的运转于己有利，就必须向它付出。”^[30]选举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这种性质导致了自民党对于像统一教这种乐于提供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社会组织的依赖。“利益输送”势必产生政治腐败。

结 语

安倍遇刺，使得自民党与统一教的“利益输送”腐败大白于天下。当统一教的“灵感商法”、高额捐款、劝诱入教、“集体婚礼”等社会问题无法掩盖，日本民众要求贯彻“政教分离”原则、解散统一教形成社会舆论后，2022年8月31日，自民党公布了“不再与统一教及其相关团体有任何关系”的基本方针^①，各地自民党基层也开始要求与统一教相关团体划清界限。2023年2月9日，自民党千叶县联合会决定在春季的统一地方选举中，所有被提名的候选人都要签署一份“誓约书”，不会与统一教等有社会问题的组织有任何关联。^[31]然而，日本自民党与统一教的“利益输送”表明，日本实行“政教分离”，但并不意味着政党政治与宗教团体完全不能产生任何联系。尽管日本宪法规定了宗教不能干预国家政权的行政事务，但宗教团体参与社会政治的权利和自由并未被剥夺，由此产生了政党与宗教团体之间“利益输送”的互动问题。

统一教与自民党接近，是希望通过自民党所拥有的政治权力来实现其利益，主要通过开展迎合自民党价值取向的活动、提供选举支持、免费为政治家输送秘书等方式拉近与自民党议员的距离；而自民党与统一教接近，是因为自民党希望统一教能成为其社会支持力量，主要通过为统一教的集会活动发贺电、致辞以及提供政治上的便利等方式作为回报。可以说，自民党与统一教的“利益输送”及互动，是双方意志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统一教来说，它们想用自己的“金钱”和“选票”，换取自民党在政治层面的支持和照顾；而对于自民党来说，则是想用自己的政治资源换取长期执政所需的统一教的“金钱”与“选票”，其本质是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相互利用，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世俗权力与宗教势力的相互利用和“利益输送”产生的政治腐败，是日本业已形成的政治生态，还将延续影响日本政党政治及选举制度。

^①具体包括：(1)要求对自民党所属的国会议员与统一教关系进行审查，并公开调查结果；(2)要求国会议员与统一教及其相关组织没有任何关系，也不与任何被指出有社会问题的团体有联系；(3)党的改革总部将发挥核心作用，讨论应如何强化审查机制，以确保议员遵守政策；(4)将在消费者问题调查委员会设立一个小组委员会，探讨针对灵感商法、捐赠等劝诱被害对策的防治措施。参见旧统一教会「関係を一切断つ」役員会で基本方針を決定自民党网站：<https://www.jimin.jp/news/information/204130.html>。

[参考文献]

- [1] 顾肃. 宗教与政治[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 [2] 黄晓林. 日本宗教法人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 [3] 飯坂良明. 宗教と現代[M]. 東京:玉川大学出版部,1981:185.
- [4] 島田裕巳. 新宗教と政治と金[M]. 東京:宝島社,2022.
- [5] Philip Hamburger.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480.
- [6] 山折哲雄. 世界宗教大事典[M]. 東京:平凡社,1991.
- [7] 若瑟兰·麦克卢尔,查尔斯·泰勒. 政教分离与良心自由[M]. 程无一,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3.
- [8] 大原康男,百地章,阪本是丸. 国家と宗教の間——政教分離の思想と現実[M]. 東京:日本教文社,1989.
- [9] 後藤光男. 政教分離の基礎理論——人権としての政教分離[M]. 東京:成文堂,2018:13.
- [10] 村上重良. 天皇制国家と宗教[M]. 東京:日本評論社,1986:247.
- [11] 宮澤俊義,芦部信喜. 全訂日本国憲法[M]. 東京:日本評論社,1978.
- [12] 岸本英夫. 世界の宗教[M]. 東京:大明堂,1993:267.
- [13] 米勒,波格丹诺.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 修订版. 邓正来,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 [14] 金泽. 宗教与政治互动的复杂性[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2):110.
- [15] 文化庁. 宗教年鑑(令和4年版)[EB/OL]. [2024-02-10]. https://www.bunka.go.jp/tokei_hakusho_shuppan/hakusho_nenjihokokusho/shukyo_nenkan/pdf/r04nenkan.pdf.
- [16] 吴廷璆. 日本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833.
- [17] 王新生. 战后日本社会变迁中的新宗教[J]. 日本学刊,2015(6):74-92.
- [18] 柿田睦夫. 統一協会の正体・本質は何か[J]. 前衛,2022(1018):25-36.
- [19] 小野泰博,奈良康明,下出積與,等. 日本宗教事典[M]. 東京:弘文堂,1985:724-725.
- [20] 世界平和統一家庭連合. 教会紹介[EB/OL]. [2024-02-19]. <https://ffwpu.jp/admission/church>.
- [21] 国際宗教研究所宗教情報リサーチセンター. 世界平和統一家庭連合[EB/OL]. [2024-04-19]. https://rirc.or.jp/database/?kyodan_db=2024-20.
- [22] 邵宏伟. 战后日本的新宗教与政治[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168.
- [23] 鈴木エイト. 自民党の統一教会汚染 追跡 3000 日[M]. 東京:小学館,2022.
- [24] 衆議院. 「統一協会」=世界平和統一家庭連合に関する質問主意書[EB/OL]. (2022-08-03)[2024-02-18]. https://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shitsumon.nsf/html/shitsumon/a209010.htm.
- [25] 池田大作,B. 威尔逊. 社会与宗教[M]. 梁鸿飞,王健,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 [26] 林尚立. 日本政党政治[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27] 朱清秀. 战后日本选举与政治资金问题[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28] 许莹亚,孙正琼,李海鸥. 日本政党法规和党内法规选译[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43.
- [29] 宮崎哲弥,島田裕巳,仲正昌樹,小川寛大. 統一教会と創価学会[J]. 文藝春秋,2022(10):98.
- [30] 刘春. 权力的陷阱与制约——西方国家政治腐败透视[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47.
- [31] 旧統一教会遮断で誓約書 公認・推薦候補に求める 自民党千葉県連.[EB/OL]. (2023-02-09)[2024-02-10]. <https://www.chibanippo.co.jp/senkyo/2023/k/chibak/1026128>.

【责任编辑 车菲菲】

Japanese garrison in Weihaiwei from pledge to bargaining chips reflected that Japan constantly adapted to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adjusted its strategy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Japan took land, and turned to claim leasehold and economic privileges, seeking to establish its own exclusive sphere of influence in China. This change was marked by the cognitive change of the garrison right in Weihaiwei. Although Japan's China strategy changed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main objective of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has remained the same.

Key words: garrison right in Weihaiwei; Treaty of Shimonoseki; Japan's China strategy; foreign garrison in China; imperialist diplomacy

Narrative of Imperial Power in Modern Japan from General to Special

ZHANG Bo(29)

Abstract: The modern Japanese imperial power narrative constructs the modern Japanese people's cognition on the emperor's power and its operation mode, which is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decision-making. By examin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narrative persuasion mechanism of the imperial power in modern Japan, we can see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narrative mode of the imperial power in modern Japan, there existed a bicultural persuasion mode conforming to the "Standard of Civilisation" of the West and imitating the politics of the holy Kings in China. However,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text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neither model can convince the public to continue to support Japan's war of aggression. Therefore, the narrative of Japanese imperial power in modern times changed to the mode, which is to whitewash the war of aggression with the special ethic of "Japan's inherent". Japanese government's policy shift from "coordination doctrine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to "Monroe Doctrine in Asia" was also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cognition from universal to special.

Key words: Modern Japan; emperor system; imperial power narration; standard of civilisation; Hua Yi Order; narrative mode

"Transfer of Benefits" between the LDP and the Unification Church under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JU Jiaying, LÜ Yaodong(38)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does not mean that party politics and religious groups can not have any contact at all. Religious groups are not deprived of the right and freedom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politics, which gives rise to the intricate and complex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and religious groups. The LDP and the Unification Church are connected through a mutual "transfer of benefits" in which the LDP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fication Church in the realm of power, while the Unification Church is the social supporter and financial backer needed by the LDP to win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LDP legislators use their political power to give the Unification Church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favours, which is a clear violation of Article 20, Item 1 of the Constitution of Japan. The assassination of Abe brought to light the LDP "gold

power politics” deal with the Unification Church, and reflected the deep-rooted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Japanese political arena that deviate from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Key words: political parties; religion;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 the Unification Church; transfer of benefits; gold power politics

Connotation, Significance, Era Value, and Basic Path of Promoting the Great Spirit of Building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ZHANG Xiaochen(51)

Abstract: To promote the great spirit of building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we must not only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great spirit of building the party, but also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subsequent value pursuit, and at the same time understand the red gene bloodline it contains. Carrying forward the great spirit of building the party in the new historical stage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CPC people to forge their character, temper their party spirit, stick to their original mission,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realize the self revolution of the party to promote social revolution, and promot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ased on the dual logical conside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order to carry forward the great spirit of building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we must deepen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at spirit of building the party, draw nutrients from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ake full use of Internet new media and other network, and open up a multi-dimensional path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the great spirit of building the party.

Key words: the great spirit of building the part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rxism; self revolution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NG Chunyu, PAN Nana(57)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ha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and improved its cultural leadership construction, promoting the enrichment of cultural leadership cont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eadership methods,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naive to mature and from simple to profou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gone through four periods of exploration and promotion, which has played a vital role. Studying the connotation and course of cultural leadership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e can get the following enlightenment: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of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following the law of cultural work is the important premise of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intellectual group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and the use of modern media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ultural leadership; ideological leadership